鳴 謝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具有版權的資料

倘若沒有芝加哥大學給予我無數的支持與激勵，本書便難以完成。在芝加哥，我學會了如何成為一名歷史學者。對於恩師布魯斯．卡明斯（Bruce Cumings）、杜贊奇（Prasenjit Duara）、何偉亞（James Hevia）和柯德雷（James Ketelaar）給予的學術與精神上的啟迪，我的感激實非言語所能表達。彭慕蘭（Kenneth Pomeranz）慷慨撥冗審閱了本書的初稿，並提出了極為寶貴的意見。本項目承蒙崔暻姬（Kyeong-Hee Choi）傾注心力，為我和不同學者牽線搭橋。艾約博（Jacob Eyferth）在我求教之時，都不吝分享建議。此外，芝加哥大學歷史系、社會科學部以及東亞研究中心為我的多次田野調查提供了資助。東亞圖書館的館員們，尤其是周原老師，總是熱情回應我的各種請求。能在學術生涯的起步階段獲得如此支持，實為莫大的榮幸。

本書的大部分修訂工作是我在瓦薩學院任梅隆博士後的三年期間完成的。在瓦薩，朋友與同事們不僅教會我如何成為一名優秀的教師，還幫助我提升寫作與研究的效率。特別感謝南希．比薩哈（Nancy Bisaha）、羅伯特．布里格姆（Robert Brigham）、瑪麗亞．赫恩（Maria Höhn）、朱莉．休斯（Julie Hughes）、詹姆斯．梅里爾（James Merrell）、昆西．米爾斯（Quincy Mills）、丘培培、蘇福兵、周宇等學者。我曾在馬里蘭大學巴爾的摩郡分校的歷史系和亞洲研究系任教，那裏的同事和學生給予我極大的鼓勵和支持，使本書的完成比預想中更加順利。在

此，我衷心感謝克里斯蒂．查平（Christy Chapin）、艾米．弗羅伊德（Amy Froide）、歐陽梅（Meredith Oyen）、楊帆、康斯坦丁．瓦波里斯（Constantine Vaporis），以及許多給予我幫助的朋友和同事。

此研究的完成，離不開多家機構的資助，包括社會科學研究委員會（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韓國學中央研究院（Academy of Korean Studies）、哈佛燕京圖書館（Harvard-Yenching Library）、美國地理學會圖書館（American Geographical Society Library）、韓國國際交流財團（Korea Foundation）以及亞洲研究學會東北亞委員會（Northeast Asia Council of the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在中國、韓國、日本和美國的田野調查期間，許多朋友曾給予我無私的幫助。在中國的調研過程中，我特別感謝崔順姬、刁書仁、姜龍範、金成鎬、金春善、李洪錫、劉德斌、孫春日、王秋彬、楊昭全、衣保中等學者。研究延邊乃至中國的民族與邊界問題，尤其是開展檔案研究和訪談，往往充滿挑戰。由衷感謝黃光春、金相虎、李范俊、曲建軍和魏小麗的幫忙，令這過程變得較為順暢。我特別要向已故的權赫秀教授表達最深的感激，每當我遇到困難時，他總是我可以依靠的良師益友。此外，李花子教授帶我深入長白山的森林考察，這次旅程成為我最難忘的研究經歷之一。

在韓國，首爾大學奎章閣圖書館和韓國學中央研究院藏書閣的工作人員提供了熱情的協助。當時還是韓國學中央研究院博士生的李成柱與我分享了關於朝鮮及朝鮮族歷史的豐富知識。在日本，劉迪和趙宏偉給予我極大的幫助。此外，在東京上野的嘈雜餐館裏，我與兩位傑出的朝鮮族歷史學者金光林和白榮勳教授多次長談，極大地拓展了我的研究視野。我還要感謝梅爾清（Tobie Meyer-Fong）教授的盛情邀請，使我能赴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擔任訪問學者。我要向哈佛燕京圖書館的姜美炅（Kang Mi-kyung）、哈佛法學院圖書館的張農吉（Zhang Nongji）以及美國地理學會圖書館的約萬卡．里斯蒂奇（Jovanka Ristic）致謝，他們在浩瀚的館藏中為我指路，幫助我尋獲諸多珍貴資料。

多年來，我曾在不同的研討會和學術會議上分享本書的部分內容。許多學者提供了寶貴的意見、批評和建議，難以一一列舉，但我必須感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具版權的資料

謝那些為我提供重要學術交流平台的朋友和同事，包括埃里克．范登．布舍（Eric Vanden Bussche）、妮可．康斯特布爾（Nicole Constable）、杭行、尼古拉斯．哈克尼斯（Nicholas Harkness）、長谷川正人、道格拉斯．豪蘭（Douglas Howland）、金永蘭（Nan Kim）、金宣旼、羅納德．克納普（Ronald Knapp）、權俊希（June Hee Kwon）、柯克．拉森（Kirk Larsen）、妮可．萊維特（Nicole Levit）、約書亞．范．利烏（Joshua Van Lieu）、馬健雄、米華健（James Millward）、李皓同（Scott Relyea）、蕭建業、邵丹、蘇曉波、戴維．桑頓（David Szanton）、王思翔、王苑菲、謝瓊、梁明芝（Myungji Yang）以及柳俊（Theodore Jun Yoo）。在研究與寫作的不同階段，與高士華、川島研（Ken Kawashima）、林東、施恩德（Andre Schmid）、孫歌、唐曉峰和汪暉的討論使我獲益良多，在此深表感謝。

學術研究是孤獨的工作，但我很幸運能身處一個跨學科、跨區域的東亞研究學者群體之中。大家熱情地分享各自的研究成果，不斷促使我重新思考邊界與人群、國家與社會、時間與空間等議題。在此，我要感謝蔡俊亨、韓玲、平田康治、許國惠、玄秀娥（Eleanor Hyun）、石川匡、史黛西．肯特（Stacie Kent）、金晟雲、金泰柱、李鎮邦、李雨航、蘭樂、劉雪婷、柯尚哲（Covell Meyskens）、卡梅倫．潘維爾（Cameron Panwell）、成國泉、瀨戶智子、鄭麗敏、湯思奧（Saul Thomas）、田耕、王飛仙、王利平、文哲凱（Jake Werner）、肖鐵、徐津、徐芃、山口紀子（Yamaguchi Noriko）、萊恩．橫田（Ryan Yokota）、苑京燕、張泠、張楊、趙海和鍾以江。此外，我要感謝夏克勤幫助翻譯部分德文法律文本，以及金芝榮（Ji-young Kim）分享她對崔南善的研究。尤其感激王元崇，他不僅審閱了本書的全部稿件，而且在過去十多年裏，持續與我探討中朝日關係的歷史與史學研究，提供了寶貴的見解。

本書最早以英文版面世，劍橋大學出版社的編輯露西．萊默（Lucy Rhymer）在出版的每個階段都傾注了極大的心血。我也要感謝兩位匿名評審，他們提出了深刻的意見與批評，為本書的完善貢獻良多，十分感激他們的時間與付出。2022年，跨越圖書出版社（너머북스）推出了本書韓文版，我需要再次向李沅埈和李志英教授兩位譯者致敬，感謝他們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保留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極為認真地核對原始文獻，幫我校正出了若干引注中的失誤。當然，我也必須感謝首爾大學金衡鍾教授，正是因為他的大力推薦，韓文版才能順利出版。至於這本繁體中文版，則是在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的組稿編輯陳甜女士的提議和鼓勵下完成，還有責任編輯陳沅宜極為認真地審校文稿，兩位展現的職業精神和超強專業能力讓我十分欽佩。也感謝我的博士生林芸不辭辛苦，幫助我核查、校訂了參考文獻格式。

最後，父母和家人的支持對我而言至關重要，言語難以表達我的感恩。我將本書獻給他們，尤其是我的妻子趙燕靈。同時，也要謝謝我們的孩子楚禾和佳耳，生活因為他們而有了無盡的歡樂。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具有版權的資料

中文版序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 保留版權的資料

蒙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不棄，這項大體完成於十年前的研究，終於能夠以我的母語出版了。對我來說，也算了卻了一樁心願。本書脱胎於我在芝加哥大學求學期間（2007–2013）的博士論文。經過數年修改，英文版在2018年由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2022年，韓國跨越圖書出版社翻譯出版了韓文版。

本書是借1881至1919年之間發生在圖們江地域的、圍繞越墾朝鮮人管轄權和中朝邊界的爭議，探討「現代」民族和國家在東亞（中、日、韓）的塑成。和傳統的外交史寫法不同，我敘述的重點不在辨析國家間爭議細節的是非曲直（並非因為其不重要，而是既有研究已很充分，我沒有更多可以補充），而是討論在這個具體的時空，「領土」、「國民」、「邊界」、「歷史記憶」和國際法等現代機制，是如何在多邊地緣競爭的情勢下重塑了人們對土地、人民、國家與國際的理解，因而也重塑了國家本身。我更希望由這個具體案例，反思過去主流歷史敘述中的民族國家本位，以及主流社會科學理論裏「傳統」與「現代」的二元對立。

猶豫再三，我還是決定自己動手完成本書的漢譯工作。這樣做出於兩個考量：一是全書使用了不同國家、不同語種的檔案及文獻，其中東亞各國的史料尤其多。當初撰寫論文和書稿的時候，這些原始材料都以英文呈現，中文版需要還原至原始樣貌。這對於不熟悉和掌握這些材料的譯者來說是項極其繁重的工作，也容易出錯。二是在撰寫英文書稿

時，很多詞彙、概念和表達方式，不得不依據英文學術語境妥協、順應。而在面對使用東亞語言的讀者時，需要有相應的還原、變化——當然，也會有適應另一種語境的妥協。

關於第二點，我想引用英文版中的〈拉丁轉寫說明〉（“A Note on Romanization”）來略作介紹。〈拉丁轉寫說明〉是學術作品中的範例性文字，讀者通常不會太注意，但它卻能大體概括我對「東亞」與「現代性」衝突的某種焦慮：

> 總體而言，本研究對伴隨現代性制度而來的各種邊界持批判立場。而這種現代性劃界最尷尬的表現之一，恐怕就是漢字分別在中文、韓文與日文文本中不同的拉丁文轉寫。例如，本研究中的一個核心概念：「間島」，在不同語境中，就需要分別按照中文的漢語拼音系統，轉寫為「Jiandao」；按照韓文的麥基恩－賴肖爾系統（McCune-Reischauer system），轉寫為「Kando」；以及按照日文的赫本系統（Hepburn system），轉寫為「Kantō」。在敘述中，我無法僅選擇其中一種拉丁化轉寫並貫徹始終，因為在不同語境下，「間島」的所指並不完全相同，更何況這一術語在各自的語義系統中，還承載著完全不同的政治意涵。話雖如此，以相同漢字書寫的這個術語，其自然的整體性在三種語言的使用者眼中是一目瞭然的，而各國國語不同形式的拉丁轉寫，卻將這種整體性撕成碎片。無奈，我只好在必要時盡量同時提供不同的轉寫形式，並對於此可能引發的混淆深感抱歉。這或許也反映了一個不幸的事實：最終，我們無法完全逃脫「民族國家化」這個囚籠——無論是土地、人民、語言、文化，還是歷史，一切都受它束縛。

當然，這種對「破碎」的焦慮在中文版中（或者其他東亞語言版中）將不會存在。但是，我們反而需要對表象上的「整全性」保持一定的反思。在共享的一套書寫系統和觀念下，不同行動者是有其自身的主體性的，差異性恰恰是這套語彙和觀念能夠被長期共享的前提。同樣，「傳統」與「現代」雖然不是截然割裂和對立的，但它們也不是毫無差別、用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具有版權的資料

「自古以來」能一筆帶過的。比如，圖們江幹流作為實體性的中朝邊界，從15世紀延續到今天，並沒有太大變化，但是我們是否能說作為概念性的「邊界」也沒有變化？換個角度問，康熙時代的圖們江/豆滿江，和今天的圖們江/豆滿江，真的是同一條邊界嗎？這些都是閱讀時需要思考的問題。

在理想狀態下，當一項研究在面對不同語言的讀者時，應對問題意識、設問方法和對話對象幾個方面重新組織。而且在完成英文書稿近十年後，我對研究中涉及到的一些問題也有了全新的認識。但由於精力實在有限，我只能「偷懶」，不在對話對象、結構和主要內容上作修訂，也未回應最近一些新的研究成果。所以，本書和原英文版基本還是同一本書。翻譯過程中，我只是訂正了一些錯誤，在語言上略為調整，適應新語境，希望避免過多的「翻譯味」。

中文版最大的不同是在書名上。英文版標題直譯應該是《在現代東亞製造邊界：圖們江劃界，1881–1919》(*Making Borders in Modern East Asia: The Tumen River Demarcation, 1881–1919*)，韓文版則是《豆滿江國境爭奪戰 1881–1919：邊界視角下的東亞現代》(두만강 국경 쟁탈전 1881–1919: 경계 에서 본 동)。這兩個書名都是出版社定的，大概是出於檢索的方便和銷售的考慮吧。中文版以略顯抽象的《劃界》為主標題，我的想法是：突出劃界同時作為「行動」、「事件」、「結構」和「象徵」的多層次含義。劃界不但是東亞遭遇的過去，也是一個未竟的過程和延續至今的狀態。中文版的另一個不同是，出版社慷慨允許我增加一些圖片，這大大增加了歷史敘述的直觀性。

在關於本書的不同訪談中，我曾談到過這項研究的緣起，此處不贅。只能說，學術研究充滿偶然性，各種機緣在不經意間就敲開思考的大門。我的例子大概可以表明，在人文社科學者的職業生涯中，博士階段的研究是極為關鍵的基礎——一個恰當的題目、一個合適的視角、一個相對有效的問題，奠定了以後很長時間內的研究志趣和方向。在本書問世之後，我陸續開啟了新的寫作，也出版了新作品，它們包含非常不同的主題：東亞與現代性、空間、地圖學史、國際法、民族、邊疆、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 具有版權的資料

微觀全球史……讀者或許可以發現，這些看似雜亂的主題，其實在本書的研究中都已有涉及。從研究者的角度說，一個題目具備多面的延展性，可以不斷推進研究興趣的廣度和深度，是非常幸運、也讓人興奮的事情。也因此，雖然這項研究有許多不夠成熟的地方，但我對自己的這個學術「起點」，卻也不敢不回望初心，敝帚自珍。

英文版出版後，本書陸續收穫了十幾篇書評，其中不少是發表在像《美國歷史評論》(*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或《亞洲學刊》(*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這類權威刊物上的。讓我覺得高興的是，這些刊物的範圍廣泛，有專注於東亞研究的，也有專注於內亞研究的；有偏重史學的，也有偏重法律或者區域研究的。能夠被跨學科、跨地域性的研究群體關注，這也許說明了，我最初在方法論上努力的方向，多少是值得肯定的。總的來說，學界傾向於將本書視為北美近幾年興起的中國邊疆研究熱潮中的其中一部，特別是對東亞的跨國史、區域史有所貢獻。類似的研究各自從東北、蒙古、新疆、西藏和西南出發，拓展了對「中國」的認知，也深化了中國與周邊關係的理解。評論大多對我的研究取徑表達贊同，也有評論指出一些不足，比如敘事中忽略了「本土人群」(即世居在邊疆的人群) 的聲音。這些批評我都誠心接受。

猶讓我欣慰的是，韓國嚴肅的歷史學者是歡迎本書的基本立場和方法的。據說，本書韓文版的翻譯，就是在中韓近代交流史權威、首爾大學金衡鍾教授的大力推動下促成的。而我雖受益金老師的學術成果良多，卻和他素昧平生。同樣研究清代中朝邊界歷史的高麗大學金宣旼老師，更是多次和我交流合作，還提供了同韓國學生、學者直接討論的機會。這些積極的互動，或許傳達出一種充滿希望的信號：學術思考是可以超越民族國家本位立場的。或者至少可以這樣說：超越性的學術思考，可以豐富和加深我們對於歷史中國家、民族的認知。通過積極的交流，達成相互的理解——哪怕具體觀點未必完全同意——也是完全可能的。

最後想強調的是，邊疆和邊界不僅代表著邊緣和分野，也在特定歷史語境中展現了中心性和聯結性。我們的視角和視野，決定了學術研究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 具有版權的資料

的高度以及對世界理解的深度。當我們意識到，現代概念和分類體系中的各種對立、排斥和界限，往往不能在具體的生活經驗及政治實踐中適用。我們要做的不是本質化這些概念和分類，強行讓經驗服從於理論；而是應該反其道而行之，反思和質疑理論框架的有效性和普遍性。邊疆是個充滿理論裂縫、概念孔洞的地方，這些裂縫和孔洞正是嚴肅的思考應該開始之處。以邊疆、邊界的實踐，去挑戰各種理論預設，絕不是為了強調「個案」對「普遍性」的偏離，而是為了重新塑造一個更為包容、更有解釋力、也更值得期待的新的普遍性。

是為序。

2025年7月於清華園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具有版權的資料